

领导人人格特点与 中国外交研究*

张清敏

【内容提要】 为探寻中国外交研究的新视角,作者将政治心理学中的人格类型理论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相结合,以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人格特点为例,探讨中国领导人的人格特点差异与新中国外交变化和转型的关系,分析人格理论与中国外交研究结合的可能性和意义。结论表明,对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来说,人格类型理论为中国外交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工具,为中国外交研究提供了进行比较研究的国际视野,克服其他理论视角对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的一些盲点,更好地解释新中国历史上中国对时代主题、对世界的基本态度、对主要大国政策以及对地区政策调整和变化的动因,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对外政策的中国特色。将人格理论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相结合也适应对外政策分析理论建设的趋势,有助于为对外政策分析理论建设贡献中国元素和中国经验,发展一种超越西方外交实践的更为广泛的对外政策分析理论。作者在结论部分提出一种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的综合性分析框架。这种框架将领导人作为研究核心,同时也不忽视其他影响因素的作用。

【关键词】 中国外交;对外政策分析;人格类型;毛泽东;邓小平

【作者简介】 张清敏,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 邮编:100871)

【中图分类号】 D82 B84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
(2014)06-0093-27

* 本文是在笔者提交给国际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2011年蒙特利尔年会的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部分内容在2014年第89期《当代中国》杂志(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上发表。瓦莱丽·赫德森(Valerie M. Hudson)、彼得·格里斯(Peter H. Gries)、帕特里克·詹姆斯(Patrick James)、克劳斯·布鲁默(Claus Brummer)、杨益(Yi Edward Yang)等学者以及《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的写作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田田叶同学将原文译成中文。笔者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中国的崛起及其更加积极的外交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更多的国际关系学者将中国外交纳入研究视野,运用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视角和对外政策分析模式研究中国对外政策,分析中国对外行为,推动了对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的繁荣。^①但是,基于不同层面的理论视角的研究在加深对中国对外政策理解的同时,也暴露了单一视角研究的弱点和局限性。鉴于此,本文将西方对外政策分析理论中有关领导人人格类型的理论与中国对外政策的研究结合起来,探寻领导人个人因素塑造和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特点和规律。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一种将领导人的个人人格因素置于对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的核心,同时也不忽视其他层次因素的研究中国对外政策的综合性分析框架。

一 问题的提出

中国学界对新中国历史上对外政策发展变化的主流解释是,领导人能正确评估国际形势的变化,准确把握中国国家利益面临的主要外部威胁,并理性地选择对外政策。因此新中国历史上对外政策的历次调整既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除了“文化大革命”高潮阶段由于林彪和“四人帮”的干扰而出现挫折外,很少有错误。^②对中国对外政策变化原因的这种认识与冷战期间海外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对中国外交史研究的主流认识是一致的,即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是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因素,中国对外政策的变化也对国际力量结构产生重要影响。^③中外学界在研究中国外交的时候,理论视角不同,却具有同样的认识和看法,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冷战期间,紧张对峙的冷战格局曾经是影响包括新中国在内的多数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力量。美强苏弱的格局的确是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奉行“一边倒”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20世纪60

^① 江忆恩:《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理论趋势及方法辨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8期,第64-73页;陆伯彬:《从冷战到中国的崛起:美国对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的变化与延续》,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0期,第66-74页。

^②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田曾佩:《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③ Ipyong Kim, ed., *The Strategic Triangle: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Paragon House, 1987; Herbert J. Allison, ed.,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A Global Perspectiv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2; Gerald Segal, *The Great Power Triangle*, 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Press, 1982; Douglas T. Stuart and William T. Tow, eds., *Chin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West: Strategic and Political Dimens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2; Richard Solomon, ed., *The China Factor*,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81; Kenneth G. Lieberthal, *Sino-Soviet Conflict in the 1970s: Its Evolu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Strategic Triangle*, Santa Monica: Rand Cooperation, 1978.

年代末70年代初,美苏力量对比的变化及其引发的对中国安全威胁的改变,也是中美关系缓和与毛泽东决定邀请尼克松访华的一个重要原因;70年代末,苏联在全球咄咄逼人的扩张以及由此所引发国际力量对比态势的新变化,也确实是促成中美关系正常化不可或缺的因素。然而,中国对外政策的变化并不总是在同一个层次发生的——毛泽东时代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是先后与苏联和美国结成不同类型的“同盟”关系,反对另一个甚至同时反对两个超级大国(20世纪60年代)。相对而言,邓小平成为中国领导人,在实现与美国关系正常化后,又积极推动与苏关系的改善,促成中国革命外交向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转变。这些调整 and 变化在方向和力度上与毛泽东时期有着显著不同。^① 对于这些差异,结构现实主义不能给出很好的解释。

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国际力量结构决定着中国对外战略和政策的调整 and 变化,那么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在国际格局中的力量对比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外交战略本不应该发生大的调整。但中国对外政策却经历了从“一边倒”到“反帝反修”的转变。更需要深思的是,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使国际关系格局经历了二战之后最大的转变,理应导致中国对外战略发生更大的改变。但中国的内政和外交却都没有发生预期的变化,而且保持了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连续性。这些状况说明,虽然现实主义理论对新中国对外政策具有一定解释力,但它在理解中国对外政策的时候存在着明显的盲点。为更加全面地理解中国对外政策,我们需要引入不同的理论视角,对中国对外政策进行其他方面的解释。

1979年的改革开放开始了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加强了中国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之间的联系,为研究中国对外政策的学者提供了观察国内政治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机会。不少学者援引中国前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在1990年答记者问时所说的“对外政策是中国国内政治的延伸”,^②寻求中国国内政治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中国对外政策决策机制的变迁、不同社会因素(如民族主义、媒体与舆论、传统文化)等对中国外交所产生的影响都得到关注,产生了不少的研究成果。^③ 这些研究加深了我们对中国对外政策不同方面的理解,但也不能全面解释日益纷繁复杂的中国对外政策。这些研究有一个共识,即关键的中国对外政策都是在等级分明的体制中制定的。所谓外交

^① Charles M. Hermann, “Changing Course: When Government Changes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4, No. 1, 1990, pp. 3-21.

^② “Qian Qichen on the World Situation,” *Beijing Review*, Vol. 33, No. 3, 1990, pp. 16-18.

^③ 张清敏:《中国对外关系的国内管理和内外统筹——国内因素与中国对外政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8期,第118-120页。

无小事,对外政策的决策权始终掌握在最高领导层手中。这些研究一致认为,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在对外政策决策中处于绝对的权威地位。改革开放后,领导人对于对外政策的影响程度主要取决于领导人的声望和权威。^①

国内外学界都很重视中国领导人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但具体情况又有所不同。在中国,主要领导人的思想已经被纳入宪法,是中国政治生活的指导;^②学习他们的思想是大学教育的基本内容,研究中国对外政策的学者很自然地关注领导人变化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然而,大多数研究或者是对中国领导人外交思想和风格的学习和诠释,^③或者是对领导人参与外交活动的描述。^④这些研究虽然有利于我们了解领导人在中国外交史上所发挥的作用,大部分并没有解释或分析他们为什么这样做。更重要的是,在宏观上强调领导人重要作用的同时,在具体问题上则是另一种状况。例如,中国外交部组织编写的中国外交史著作有这样的描述: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国政府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代表团访问苏联,以探寻中苏关系改善的可能性。这本身即是基于对领导人个人作用的重视而采取的外交行动。但是,在访问期间,苏联国防部部长马林诺夫斯基(Rodion Yakovlevich Malinovsky)元帅对随同周恩来访问的贺龙元帅提出了一项中国不能接受的要求,让双方失去了改善两国关系的机会。他说:“不要在政治上耍魔术,不要让任何的毛,任何的赫鲁晓夫再妨碍我们。”“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马林诺夫斯基的话当场遭到周恩来、贺龙的严厉驳斥。^⑤有人认为,中国对马林诺夫斯基言论的态度实际上否认了领导人在中苏关系恶化中的作用。因此,多数中国外交史的著作都没有将领导人的作用看做是中苏关

^① Doak A. Barnett,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in China: Structure and Proces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5; Kenneth G. Lieberthal and Michel Oksenberg, *Policy Making in China: Leaders, Structures, and Proces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Carol Lee Hamrin and Suisheng Zhao, *Decision-Making in Deng's China: Perspective from Insiders*, Armonk: Sharpe, 1995; Michael D. Swaine,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i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1996; Lu Ning, *The Dynamics of Foreign-Policy Decision-Making in Chin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7.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修订)的序言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开展各项建设工作。

^③ 裴坚章:《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编写组:《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

^④ 蒋建农、王宏斌:《毛泽东外交生涯第一幕》,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裴坚章:《外交战略家毛泽东》,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李捷:《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内政外交》,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刘万镇、李庆贵:《毛泽东国际交往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钟文:《邓小平外交风采实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外交风采》,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⑤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59页。

系恶化的原因。^①

在国外,对中国政治的研究非常重视领导人的作用,其中对毛泽东的研究是中国政治研究中一个持续不断的主题。例如,早期从政治文化角度对毛泽东政治行为和领导方式的研究、近期从毛泽东的战争经验和革命理念对中国对外决策影响的研究都是典型的代表。^② 2005年出版的一部毛泽东传记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引发了对毛泽东研究的广泛关注和新一轮的争论。^③ 近期对邓小平研究的新成果代表了对中国领导人研究的新趋势。^④ 但是,这些研究关注的重点不是中国对外政策,更没有与对外政策分析的相关理论研究相结合。因此,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等西方学者回顾中国对外政策研究领域状况时,在梳理了所有主流的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分析理论都被用于研究中国对外政策的状况后指出,“研究中国对外政策的学者很自然地关注领导人个人(如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对外政策倾向的影响。但是,我这样做的时候往往却忽视有关人格类型、领导人类型、决策单位类型等其他文献的帮助”。^⑤

中国对外政策研究对人格类型和领导类型等对外政策分析理论的需求,与该理论界的另一种需要不谋而合。美国对外政策分析领域的代表学者玛格丽特·赫尔曼(Margaret Hermann)在探讨对外政策分析理论研究的现状和发展方向时指出,在研究决策的文献中所存在的“美国偏见”让决策理论很难推广到不同于美国的其他政府和文化背景下。对外政策分析理论建设需要将眼光投向美国以外的地区。^⑥ 适应这样

①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204-281页;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史》,第111-126页;曲星:《中国外交50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1-270页;牛军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9-142页。

② Lucian W. Pye, *Mao Tse-tung: The Man in the Lead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Richard H. Solomon, *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Shuguang Zhang, *Mao's Military Romanticism: China and the Korean War, 1950-1953*,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5.

③ Jung Chang and Jon Halliday, *Mao: The Unknown Sto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5; Gregor Benton and Lin Chun, eds., *Was Mao Really a Monster? The Academic Response to Chang and Halliday's Mao: The Unknown 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0.

④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Boston: Belknap Press, 2011; Maurice Meisner, *The Deng Xiaoping Era*,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6; 傅高义著,冯克利译:《邓小平时代》,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版。

⑤ Thomas J. Christense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Conclusi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391.

⑥ Margaret G. Hermann, "How Decision Units Shape Foreign Policy: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3, No. 2, 2001, p. 49.

的需求,近年来对外政策分析学术群体越来越重视南方国家(Global South)对外政策的研究,试图将对外政策分析理论建设扩展到更多的国家。日益崛起的中国自然是他们关注的重点,也产生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冯慧云运用行为码(operational code)对毛泽东和邓小平战略思想的研究是其中的代表。^①与此同时,中国的一些外交史著作也开始关注领导人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影响。^②本文试图加入这一研究群体,以期为对外政策分析理论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的结合贡献绵力。

研究中国对外政策的学者需要借鉴对外政策分析中的人格类型理论,从人格类型角度构建对外政策比较分析理论的学者也提出,需要一些非美国化的案例。要满足二者的需求,需要将这两个国际关系研究的子领域进行整合。本文尝试探索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本文将探究邓小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之后,中国对外政策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因为中外学者都认为中国对外政策在不同的领导人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例如,有中国外交史教材在谈到“中国当代外交在中国不同领导人时代的主要特色”时说,“毛泽东同志那个时代的外交,其主题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与支持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民族革命,简言之反帝、革命;在邓小平同志时代的外交,其主题是和平与发展”。^③海外一位研究中国对外政策的代表人物以同样的视角提出,毛泽东的“政策反映了为实现经济自给自足、获得强制性的军事力量、加强意识形态力量和进行战略军事演习而背水一战的心态,而他的继承者——邓小平从1977年开始的政策则是对中国庞大的人口以及毛泽东政策带来的沉重经济、外交代价的一种反应”。^④事实上,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中国对外政策的变化是全面的,包括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对中国外交目标的定位、与主要大国的关系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等。这种变化将中国外交史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1949-1978年的毛泽东时期和1978年之后的邓小平时期。

对两个伟人领导时期的新中国外交的代际差异,学术界尚没有足够的研究和探讨。如前文提到的新中国外交史教材指出,新中国外交之所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因为主客观条件不同;其次是前人的实践,经过总结成为了后人的经验教训,后人可

^① Huiyun Feng,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Confucianism, Leadership and Wa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②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尤其是第519-525页,“关于独特性格的影响”。

^③ 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第7-8页。

^④ David M. Lampton, “China: Outward Bound but Inner-Directed,” <http://www.sais-jhu.edu/pubaffairs/publications/saisphere/winter06/lampton.html>, 登录时间:2007年1月4日。

以在此基础上做有益的继承、扬弃和充实完善”。^①这种解释注意到了主观和客观条件的差异,但关注更多的还是客观方面,对领导人主观作用的探讨并没有展开。问题是,如果领导人能够对形势进行客观的判断,那么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一位领导人为什么没有对形势做出客观的判断,并对政策进行调整?相反,当时的领导人坚持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②只是到了坚持认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③的邓小平成为领导人时,中国共产党才在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科学和全面的评估后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鉴于以上原因,本文认为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人格差异在中国对外政策的转型和演变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了说明这一观点,本文将运用一个在政治心理学领域被广泛运用的人格类型框架,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人格共同点和差异进行比较,并与中国的对外政策联系起来,试图回答以下问题: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人格有哪些共同点?有哪些差异?他们分别是什么类型的领导人?这些共同点和差异与中国对外政策中的连续性和变化有何关联?将人格类型理论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结合起来对对外政策分析理论建设和中国对外政策研究有何意义?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的第一部分提出问题;第二部分回顾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主要路径,并介绍本文所使用的一种被广为认可的比较分析框架;第三部分考察毛泽东和邓小平个性的相似之处以及中国对外政策的连续性;第四部分关注二者的不同人格特点与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 and 变化;第五部分是结论,总结将中国对外政策研究与人格理论相结合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并提出一种研究中国对外政策的综合性分析框架。

二 人格类型理论

尽管针对个人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从未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但它却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修昔底德(Thucydides)、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以及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等经典政治思想家都明确承认人性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前提区别即建立在对人性不同理解的基础上。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在其成名作《人、国家与战争》中,提出了分析战争原

① 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第8页。

② 《学习文件抓纲要》,载《人民日报》,1977年2月7日,该文同时发表在同一天出版的《红旗》和《解放军报》。

③ 《邓小平文选(1982-1992)》(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39页。

因的三个意象或层次——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他提出,“世界历史的发展离不开创造历史的人”,“如果不理解人的本性就不可能有政治学理论”。他的第一意象认为,“人的邪恶及其不恰当的行为导致了战争,如果个人的美德能够被普及,就会有和平”。^①然而,随着冷战的展开,结构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占据了支配地位,成为体系层次的坚定支持者。^②对个人层次的研究被边缘化了。

然而,国际关系归根结底是不同国家间人的关系,国家对外政策是或单独或集体的人以国家名义制定的。对于人对国际政治影响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过。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心理学的不同概念、不同研究路径都曾被用于对国际政治和对外政策的研究。虽然这些研究在很多方面都是互相交叉的,但是可以粗线条地将它们划分为三个流派。^③第一个流派沿袭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心理分析传统,关注领导人的成长经历对其心理的影响,追溯领导人从幼年到成年在人生不同成长阶段的发展状况,借助精神分析法寻找政治领导人的心理特征和政治行为特点之间的联系。这一流派的学者大多有心理医生的背景,习惯使用他们熟悉的临床诊断方式和概念,注重从病理角度对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如关注政治领导人特定精神特质(如神经质、自恋和偏执等)以及长期服用特定药物可能对其行为的影响。

第二个流派可以被称为认知研究。这一类学者从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知过程来理解人的行为特征和行为根源。研究对象包括人们知觉、记忆、信息处理过程中的问题表征、语言表达、意象和思想的形成以及问题解决过程中的思维方式和特点等,包括敌人意象和镜像、认知图、归因论、知觉与错误知觉、操作码、情感及态度和动机等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等。

第三个流派的学者尝试通过对处于主导地位的领导人的人格特点来理解特定国家对外政策的特点。这类学者或根据领导人对工作的态度,或根据领导人与环境的关系,抑或根据领导人的人生目标和动机等来把握领导人的人格特点。其中,玛格丽特·赫尔曼根据一些特定的干预变量来划分领导人的人格类型,把握其人格特点与国家对外政策行为之间关系的框架是最具影响力的框架之一。江忆恩等在呼吁采用更细致的方法研究中国对外政策时所提到的人格理论就是赫尔曼的人格分类框架。^④西方政治心理学界有比较研究表明,赫尔曼的分析框架与其他人格理论的分析框架相

^① Kenneth N.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p.28, p.39.

^②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③ 以下内容参见张清敏:《国际政治心理学流派分析》,载《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3期,第71-101页。

^④ Thomas J. Christense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Conclusi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 p. 391.

比也最有解释力。^①因此,本文选择使用赫尔曼的分析框架。

赫尔曼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但她一生所从事的专业是对外政策的研究。她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将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领导人的人格特点与国家对外政策行为联系在一起的分析框架。^②这一框架并不夸大个人的作用,也不关注一般人的性格特点,而只关注处于支配地位的领导人(predominant leader)。所谓处于支配地位的领导人,即他们“能够压制所有反对意见及具有不同意见者,在必要时他们具有独立做出决策的权力”。^③只有他们的人格特点才能够对国家的对外政策产生影响。即使是这样的领导人,他们的人格特点也只有在领导人有很大的决策余地、决策环境含糊不清、领导人亲自积极参与决策过程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三个干预变量决定了领导人的信仰体系是否能对国家的对外政策结果产生影响。这三个干预变量分别是:(1)对外交事务的兴趣;(2)在外交和外事领域的经验、训练以及由此所积累的专业知识;(3)对决策环境的敏感度等(参见图1)。

在这个模式中,三个干预变量发挥不同的作用。首先,兴趣提供领导人参与对外事务的驱动力。对外交具有浓厚兴趣的领导人更多地介入国家对外事务,参与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有更多的机会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结果。对外交缺乏兴趣的领导人在对外事务上往往会相对超脱,把外交事务交给自己的外长或其他人来处理,领导人的人格特点就不可能对对外政策的结果产生太多的影响。例如,在美国对外政策研究的历史上,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约翰·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的人格特点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而学习国际关系的学生多数不了解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和约翰·肯尼迪政府的国务卿是谁。因为艾森豪威尔对外交缺乏兴趣,使国务卿杜勒斯在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而后两位总统对外交的高度兴趣使他们频繁地介入到对外事务中,他们不仅成为对外政策的制定者,而且成为对外政策的落实者,国务卿的作用就成为辅助性和微不足道的。

^① Charles Snare, "Applying Personality Theory to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Evaluating Three Methods of Assessment," in Eric Singer and Valerie Hudson, eds., *Political Psychology and Foreign Polic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2, pp. 103-134.

^② Margaret G. Hermann, "How Decision Units Shape Foreign Policy: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pp. 47-81; Margaret G. Hermann, "Explaining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Using th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al Leader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4, No. 1, 1980, pp. 7-46; Margaret G. Hermann, *Assessing Leadership Style: A Trait Analysis*, Columbus: Social Science Automation, Inc., 1999; Margaret G. Hermann and Charles F. Hermann, "Who Makes Foreign Policy and How: An Empirical Inqui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3, No. 4, 1989, pp. 361-387.

^③ Margaret G. Hermann, "How Decision Units Shape Foreign Policy: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p. 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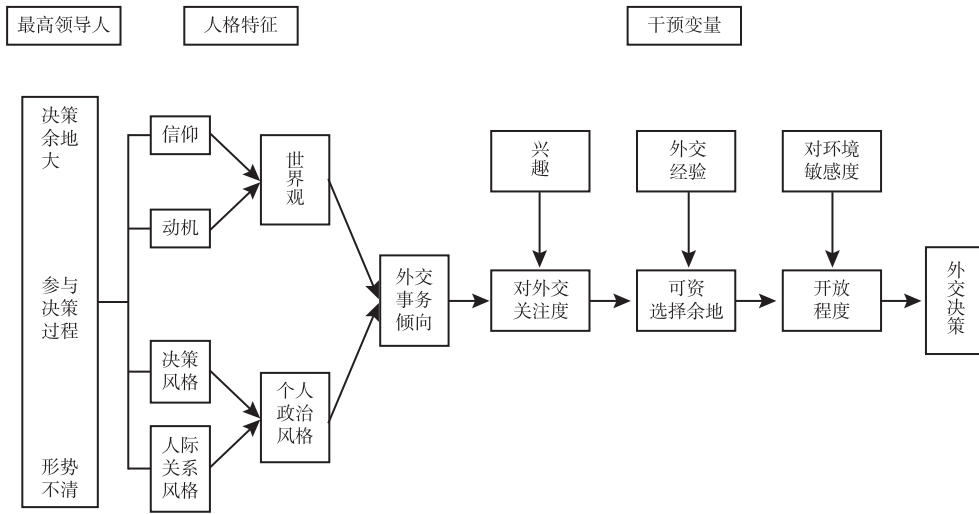


图1 人格影响对外政策关系示意图^①

其次,与没有或较少受到训练和(或)外交经验匮乏的领导人相比,那些受到更多相关训练或在对外事务中有丰富经验的领导人,对对外政策的结果往往产生不同的影响。后者在遇到外交议题的时候有更多的政策选项可供选择,知道如何根据需要进行行动,个人人格特点所产生的影响相对有限。而那些外交和外事经验、专业知识匮乏的领导人,在决策的时候选择和回旋的余地相对有限。他们更多依据自己解决问题的本能倾向来进行决策,从而使自己的信仰等人格特点对外交政策的结果产生更大的影响。

最后,赫尔曼认为,最重要的干预变量是对决策环境的敏感度(sensitivity to environment)。这一指标又可以划分为对外部信息的开放程度(openness to information)、与环境的关系以及决策模式等。对环境敏感度较低的领导人往往排斥与自己信仰不一致的外部信息,不断寻找能够支撑自己观点的信息,或者根据自己的信仰来解读来自外部的信息;他们根据自己的信仰体系挑战环境的约束(challenge constraints);通过自上而下的过程做出政策决策。这种类型的领导人可能赋予国家对外政策更多自己人格特点的痕迹。而敏感度较高的领导人对外部新的信息保持开放,更愿意去接受

^① Margaret G. Hermann, "Effects of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al Leaders on Foreign Policy," in Maurice A. East, et al., eds., *Why Nations Ac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for Comparative Foreign Policy Studies*, Beverly Hills/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78, p. 63; Margaret G. Hermann, "Assessing the Foreign Policy Role Orientations of Sub-Saharan African Leaders," in Stephen G. Walker, ed., *Role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63.

和吸收新的信息;尊重环境的约束,按照环境的要求去做;通过自下而上的过程决策。对这样的领导人来说,环境对政策结果的影响可能超过领导人自身的信仰和人格特点的影响。

在詹姆斯·巴伯(James D. Barber)及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之上,赫尔曼进一步发展出一个新的分析维度,即将领导人的动机与其国家对外政策行为联系在一起。她认为,“那些主要是问题或事业导向的领导人对政治环境的敏感度更低,他们知道需要做什么并将其付诸实践。那些关系导向的领导人对政治环境的敏感度较高,因为他们只有通过与别人互动才能感到满意和满足”。^① 根据这几个坐标,赫尔曼提出了领导人类型的框架(参见表1)。^②

表1 领导人类型

对约束的反应	对信息的开放性	动机	
		问题导向	关系导向
挑战约束	封闭	扩张型 (expansionistic)	布道型 (evangelistic)
讨伐型(crusader)			
挑战约束	开放	渐近型 (incremental)	魅力型 (charismatic)
战略型(strategic)			
遵守约束	封闭	指令型 (directive)	咨询型 (consultative)
实用主义型(pragmatism)			
遵守约束	开放	反应型 (reactive)	适应(随和)型 (accommodative)
机会型(opportunistic)			

本文在探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人格特点及其差异的时候,将主要依据《毛泽东外交文选》和《邓小平文选(1982-1992)》(第二卷和第三卷)。《毛泽东外交文选》汇集了毛泽东从建国前到去世这段时间内有关中国外交的173篇文章、演讲、谈话、评论和电报,包含已经公开的关于毛泽东与中国外交的主要一手资料。^③ 在《邓小平文选(1982-1992)》(第三卷)的119个条目中,有26篇谈的是国际事务,97篇包含有关对外事务的内容,73篇是邓小平与外国客人的谈话。与大多数情况下领导人的讲话多数是由写作班子撰写,然后经过集体讨论后以政府文件方式出现的文章有所不同的是,《毛泽东外交文选》和《邓小平文选(1982-1992)》中的大多数文章都是毛泽东谈

① Margaret G. Hermann, "How Decision Units Shape Foreign Policy: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p. 93.

② Margaret G. Hermann, "How Decision Units Shape Foreign Policy: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p. 95.

③ 《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话的逐字记录以及邓小平的即兴谈话或发言。^①虽然根据形势的变化,其中一些文章经过了一定的编辑或加工,但作为一个整体仍然展现了两位领导人显著和鲜明的个人特色,充分揭示了他们的内心世界,是研究他们人格特点最理想、最可靠的一手资料。在可以增加一手资料的说服力的时候,二手资料将作为补充证据。

具体来讲,笔者首先根据赫尔曼的人格类型框架仔细阅读这些一手材料,寻求毛泽东和邓小平属于不同人格类型的痕迹和证据。如果这些材料能够清晰地区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人格特点,那么就可以找出他们人格特点与中国对外政策和对外行为的关系。如果他们之间的联系是显著的,那么就可以采用内容分析方法进行更加科学和系统的重复性研究,而这样的研究不仅可以用于研究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人格特点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也可以研究其他领导人的人格特点对中国对外政策乃至国内政策的影响,从而丰富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的思路。

三 人格特征的相似性及中国对外政策的连续性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人格特征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差异。这些相似和差异与中国对外政策都有着某种不同的联系。在此首先分析他们人格特点的相似之处。

(一) 处于主导地位领导人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属于赫尔曼人格类型框架中处于支配地位的领导人。“如果说在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毛泽东在对外政策决策时依然需要征求最高领导层成员的意见的话,那么到了 50 年代中期,毛泽东已经掌握了最高政治权力,可以独自做出所有重要决定”。^②中国学者的研究大都认为,在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外交战略转变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居于主导地位”。^③“毛泽东有足够的权威独自确立外交政策议程和指导方针”,“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反对毛泽东的政策。与美国关系缓和的敏感过程加强了‘毛主导’的模式”。^④

邓小平在对外政策方面也享有类似的权威。钱其琛将从改革开放到冷战结束之

^① 《邓小平文选(1982-1992)》(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② Lu Ning, *The Dynamics of Foreign-Policy Decision-Making in China*, p. 86.

^③ 李捷:《毛泽东向两极格局的挑战——50 年代后期到 1976 年的中国外交》,载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46 页。

^④ Xia Yafeng, “China’s Elite Politics and Sino-American Rapprochement, January 1969–February 1972,”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8, No. 4, 2006, pp. 26–27.

后中国外交的重大活动和决策都归功于邓小平。^① 一个具体的例子是,“一国两制”的设想最初是邓小平在与一名美籍华人教授谈到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时候提出的。^② 1984年6月在会见香港工商业代表团成员及知名人士的时候,邓小平明确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而且指出这一模式不仅可以用于解决台湾问题,而且也可用于香港和澳门问题。^③ 在如何实施这一政策的时候,邓小平也一直掌握着最终的决策权。^④

毛泽东和邓小平是新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两个伟人,他们在不同时期的中国内政外交上都是处于主导地位的领导人,是研究领导人人格特点对国家对外政策产生影响的典型。

(二) 相似的信仰体系

信仰是“对某种宗教或主义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的准则”。^⑤ 价值观是指“人们对人生价值的认识和根本态度”。^⑥ 西方学者认为,前者是人们对事物及其属性的认识的集合,反映了他们认为什么是正确的;后者反映了一个人希望看到什么事情发生,即使目前它还不是真实的。^⑦ 毛泽东和邓小平有着类似的信仰与价值观体系。他们都拥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坚信共产主义优于并将最终取代资本主义。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一生坚持不懈地努力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当认识到苏联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而成为修正主义的时候,尽管中国面临美国的威胁,他也不惜调整对外政策,把反对修正主义提高到与反对帝国主义一样的高度。与国外“反修防修”战略相适应,为了避免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他错误地发动了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在少年时代就参加了中国革命,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即与毛泽东等领导人一道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并肩战斗。在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主要领导人后,他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保持中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纯洁性,避免资产阶级的“精神污

① 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编写组:《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9-11页。

② 《邓小平文选(1982-1992)》(第三卷),第30-31页。

③ 《邓小平文选(1982-1992)》(第三卷),第30-31,58-59页。

④ 例如,在香港回归前夕,某领导人在与媒体接触的过程中提出,香港回归后中央政府“可以考虑不派军队进驻”香港。邓小平知道后专门把记者请回来,纠正了这种说法,并强调指出,在香港问题上,只有他和另外几个领导人的讲话才代表中国政府的政策。参见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352页。

⑤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第六版普及本)》(下),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4422页。

⑥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第六版普及本)》(上),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26页。

⑦ Martha Cottam, et al.,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sychology*, Mahwah and London: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ions, 2004, p. 125.

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邓小平仍然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①“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②根据他们的信仰体系的共同点,中国对外政策在邓小平时代不应该与毛泽东时代有大的差异。

(三) 对外交事务都有浓厚的兴趣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外交或国际事务的专业训练,他们在外交方面也没有丰富的经历,但是他们都对对外事务有较大的兴趣,都参与了中国重大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毛泽东对外交的兴趣源于中国在紧张的两极体系中恶劣的生存与安全环境。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始终面临着来自某个超级大国的威胁,外交一直处于中国政治议程的最前列。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不得不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外交工作中。《毛泽东外交文选》的有关文章反映了他对外交工作的兴趣和参与程度。改革开放后,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有所改善,外敌入侵的威胁降低了,但邓小平对外交事务的兴趣却并没有降低。邓小平亲自参与处理与大国关系,做出了重大外交决策。共同的兴趣使他们广泛介入中国外交事务,从而使他们的个人人格对中国对外政策产生影响。

毛泽东和邓小平人格特征的相同一面,首先也表现在他们思想上的连续性。邓小平对此有清楚的表述。他说,“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③“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④“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⑤其次,在对外政策上,邓小平时期与毛泽东时期也具有显著的连续性,例如,他们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都认为主权在外交中是至高无上的,在外交工作中都坚持独立自主原则,都反对其他国家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都坚定地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不可侵犯,坚持台湾必须与祖国大陆统一。对于苏联向中国提出的建设联合潜艇舰队和长波电台的要求,毛泽东指出,“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⑥在西方国家借人权问题对中国内政进行干涉的时候,邓小平则指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

① 《邓小平文选(1982-1992)》(第三卷),第382页。

② 《邓小平文选(1982-1992)》(第三卷),第383页。

③ 《邓小平文选(1982-1992)》(第二卷),第347页。

④ 《邓小平文选(1982-1992)》(第二卷),第148-149页。

⑤ 《邓小平文选(1982-1992)》(第二卷),第291页。

⑥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30页。

了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①最后,在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时期的中国明确表示,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是中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②邓小平时期的中国主张根据中国人民与世界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以及事情的是非曲直确定在特定问题上的对外政策。^③

四 人格特征差异性与中国对外政策的变化

虽然毛泽东与邓小平的人格特征有一些共同点,但他们之间也具有显著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可以更好地解释中国对外政策中结构现实主义和其他国际关系理论不能很好解释的那些变化和发展。

(一) 毛泽东的人格特征

1. 对信息封闭

“对信息封闭”指的是领导人只关注与自己信仰和观点一致的信息,忽略相反的信息,或者有选择性地解读这些信息来保持自己认知的一致性。《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刊录的他于1974年与赞比亚总统肯尼思·卡翁达(Kenneth D. Kaunda)关于第三世界认识的看法,非常典型地反映了毛泽东对待外部信息态度的特点。^④

“第三世界”这个概念是法国经济学家和人口统计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1952年在《观察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第一次使用的。^⑤在毛泽东提出他的“三个世界理论”之前,国际上已经有一种关于三个世界的认识。卡翁达对毛泽东问题最初的回答反映了这种认识。1974年,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对此做了详尽阐述,成为在此后相当一段时期影响中国外交的思想。有人认为,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为20世纪70年代中国反霸统一战线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考虑到“一条线”的思想是1973年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时候提出的,而“三个世界理论”是1974年提出的,符合逻辑的可能是,“一条线”的战略塑造了“三个世界理论”的思想,后者给前者提供了合理化的理论依据。

反映毛泽东“认知一致性”人格特点的内容,在《毛泽东外交文选》中不限此一处。

① 《邓小平文选(1982-1992)》(第三卷),第331页。

② 韩念龙:《当代中国外交》,第3页。

③ 韩念龙:《当代中国外交》,第340页。

④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600-601页。

⑤ 宫力:《跨越鸿沟——1969-1979年中美关系的演变》,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6页。

比如,在人人都对核武器感到恐惧的核时代,尽管毛泽东不遗余力地坚持发展核武器,但表面上他坚持认为核武器是“纸老虎”,认为原子弹和冷兵器没有什么区别。这种看法导致毛泽东与尼赫鲁(Javāharlāl Nehrū)第一次见面时即发生了冲突。^①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更明确和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关于核武器的看法,其思想甚至行为方式再一次反映了他对核武器和核战争所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②他的讲话让东欧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感到困惑和担忧,^③也是赫鲁晓夫违背诺言、撕毁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协议的主要原因之一。

2. 挑战外部约束

毛泽东是一个外部环境的挑战者。他具有一个由内向外看问题的视角,总是根据自己的信仰而不是根据外部的情境采取行动,处理日常外交问题的行为方式与周恩来形成了鲜明对比。《毛泽东外交文选》的最后一篇记录了毛泽东与周恩来在1973年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的谈话,非常明显地反映出两位领导人对于外部环境的不同态度。^④周恩来则对外部环境非常敏感,在接待希思时首先考虑到的是国际惯例,不冒犯现任英国首相威尔逊,因此没有为来访英国前首相希思安排仪仗队。但是毛泽东不在乎谁是英国的首相,坚持将希思当做英国首相对待,要求按照首相的规格接待,应该为希思安排具有仪仗队的欢迎仪式。当毛泽东坚持己见时,周恩来立即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并遵从毛泽东的意思,表示在希思离开北京的时候加上。如果比较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处事风格和对外部环境的关系,毛泽东的这种人格特点就更加清晰可见了。与毛泽东相比,周恩来始终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外部环境的要求调整自己的策略。比如,1955年的万隆会议前夕,国际局势对中国非常不利,周恩来参会的过程也充满风险,针对一些国家在会议上对共产主义的攻击,周恩来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将准备好的发言稿散发,并临时准备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求同存异”的讲话,产生了积极的影响,^⑤打开了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局面。1957年,毛泽东参加莫斯科会议,得到苏联的高度重视和隆重接待,但是他在会议上讲话的内容和方式,在中国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播下了分裂的种子。1958年,周恩来辞去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部长,中国的对外政策开始出现了左转,从和平共处转向了革命外交,两者之间存在

^①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70-171页。

^②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91-300页。

^③ 蒲国良:《走向冰点:中苏大论战与1956-1965年的中苏关系》,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44-48页。

^④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602-603页。

^⑤ 《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12-125页。

何种联系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索的问题。遗憾的是学术界并不多见对毛泽东和周恩来人格差异对中国外交主题改变影响的研究。^①

3. 自上而下的决策过程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重要决策多是经过集体讨论后做出的。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后,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中心的决策模式。他虽然并不参与政治局的会议,但仍然掌握着重要对外政策的决策权,大多数政策都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过程决策的。前外交部副部长和中央外办主任刘华秋的一篇文章反映了毛泽东后期的决策特点。^②

在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后,中国政府决定派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当外交部开始考虑由谁担任代表团团长时,周恩来让外交部先询问毛泽东的意见。1974年3月19日毛泽东的联络员问他时,毛主席“稍作沉思后说:由邓小平同志担任团长好,但暂不要讲是我的意见,先由外交部写请示报告”。^③外交部于同年3月22日起草了“关于参加特别联大的请示报告”,其中提出由邓小平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这份报告先提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将其提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当天圈阅同意。在毛泽东的坚持下,政治局于4月2日再次召开会议,批准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

这个事例说明,虽然毛泽东让外交部通过自下而上的过程提交报告,提出政策建议,但是政策建议是按照毛泽东的意思提出的。当领导层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考虑,使这个决定陷入政治漩涡后,最后仍然由毛泽东拍板决定。一旦所有人都明白,由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大特别会议是毛泽东的意见,持有不同意见的声音都沉默了。这一案例进一步证明一些学者的观点——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虽然很少参加政治局的会议,但政治局几乎所有的重大决策均需经他批准后才能实施”。^④“缓和中美关系的最初设想不是自下而上(先由外交及政策研究部门提出),而是自上而下产生的。即:最高领导人有了初步想法,然后让有关部门探索可行性。”^⑤

① 单金萍:《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个性与中国的对外政策》,北京: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论文2011年。

② 刘华秋:《正义战胜邪恶:记围绕邓小平同志出国的一场斗争》,载《新中国外交风云》编委会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五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7页。

③ 刘华秋:《正义战胜邪恶:记围绕邓小平同志出国的一场斗争》,载《新中国外交风云》编委会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五卷),第24页。

④ 官力:《中国的高层决策与中美关系解冻》,载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第674页。

⑤ 官力:《中国的高层决策与中美关系解冻》,载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第675页。

有关研究表明,在毛泽东时期,中国对外政策最重要的决定,包括20世纪50年代的炮击金门、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1969年的中苏边境冲突、1970年的乒乓外交、1971年的中美关系缓和和中日邦交正常化等,差不多都是经过这样的决策方式决定的。^①

4. 成就导向型动机

毛泽东出生于清朝末期,那时的中国面临被帝国主义国家瓜分的危险。毛泽东从小即有鸿鹄之志,鲲鹏之梦。其少小离家求学之初,即抄录“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出名誓不还”的诗句表达自己的抱负。青年时即开始在政治上十分活跃,他对中国人民可能会失去自己的国家并成为“亡国奴”而感到担忧,从小就树立了报效国家的雄心壮志。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期,他于1936年创作的《沁园春·雪》在描写了中国北方的美丽景色后对历史伟人的感叹,^②反映了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的理想和大志。

当中国革命处于困难的时期,毛泽东的雄心就跃然纸上;在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后,他的这种雄心就获得了得以实现的动力。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他表示,“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③斯大林去世后,自信得到进一步加强的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自己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为中苏大辩论树立了靶子,在思想上树立起与苏联的对立面,成为中苏分歧和大辩论的直接导火索。

(二) 邓小平的人格特点

从对新信息的开放程度、对决策环境的态度、制定政策的程序和方式以及处事的基本动机等人格指标上看,邓小平与毛泽东均有所不同。

1. 对新信息高度开放

邓小平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反映了他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改革开放政策与邓小平对新信息保持开放的人格特点有着很大关系。在1978年9月去吉林省考察时,邓小平曾说:“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④三个月后,在确立邓小平在党内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讲话指出,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他强调,“只有解放思想了,我们才能正确以马列主

^① Lu Ning, *The Dynamics of Foreign-Policy Decision-Making in China*, 1997.

^② 《毛泽东诗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22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5页。

^④ 《邓小平文选(1982-1992)》(第二卷),第128页。

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①他根据新的信息和情况,解放思想,纠正了中国内政和外交的错误,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对中国的对外政策进行了全面调整。

在1985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毫不避讳地承认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犯了错误。他说,从70年代末开始“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②“第二个转变,是我们的对外政策。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③通过这些彻底的变化,中国对外政策进入了邓小平时代。

阅读《邓小平文选(1982-1992)》第二卷和第三卷可以发现,邓小平讲得最多的就是“解放思想”。他不断强调“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不要固守一成不变的框框”,^④要始终保持一种开放心态,坚持“有错必纠”,对于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改正。^⑤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发展,正是随着邓小平对这个事业认识的不断深化而深化。

2. 适应决策环境

邓小平的信仰体系与毛泽东没有差别,但邓小平不是去挑战外部环境,而是根据形势发展变化调整自己的目标。在谈到新中国在内政外交上的错误时,邓小平说,之所以出现这些错误,就是因为“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将经济搞上去。主观意愿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遭受损失”。^⑥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邓小平在工作中不断强化“因地制宜”,按照“经济规律办事”。^⑦

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是根据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而不断调整和再调整的过程。中国的改革政策从乡村开始实施,逐步扩展到城市;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也是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地区到内陆地区的开放过程

① 《邓小平文选(1982-1992)》(第二卷),第141页。

② 《邓小平文选(1982-1992)》(第三卷),页126-127码。

③ 《邓小平文选(1982-1992)》(第三卷),第128页。

④ 《邓小平文选(1982-1992)》(第三卷),第261页。

⑤ 《邓小平文选(1982-1992)》(第二卷),第147页。

⑥ 《邓小平文选(1982-1992)》(第二卷),第346页。

⑦ 《邓小平文选(1982-1992)》(第二卷),第313页。

而逐步实施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体现了他的处事特点。冷战结束后,邓小平在1992年视察南方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① 他的态度为中国改革提供了新动力。

邓小平开创并始终坚持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他提出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② 1989年以后,面临西方的制裁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复杂形势,邓小平提出,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③

3. 两种决策过程

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与毛泽东时代的决策过程有很多的相似特征。从改革开放到冷战结束初期,中国主要和关键的对外政策多数都是由邓小平经过自上到下的决策过程决定的。但是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领导人不可能掌控中国对外关系的方方面面,做出对外政策的每一项决定。随着对外政策议程的增加,传统上业务以国内工作为主的机构和部门也开始参与对外事务,很多对外政策是由较低级别的机构提出的,决策常常是通过自下而上的过程,只有成为一个有争议或重要的问题时才可能引起最高层的注意和介入。^④ 20世纪80年代一个突出的领域是中国的对外军售政策。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一些军火企业开始对外增加武器销售。随着中国对外军售的增加,美国开始加大对中国的压力,逐渐使其成为中国外交中的一个问题。^⑤ 对于大部分这样的对外政策问题,往往需要经过从下到上的过程,引起政府最高层的关注。邓小平参与并做出引发争议的对沙特阿拉伯的导弹出口问题就是一个被学界所广泛关注的典型例子。^⑥ 80年代的多个典型的中国对外决策,包括中国总理是否应该按计划对美国进行回访、美国海军访问中国港口、是否引渡一名1985年劫持俄罗斯飞机到中国东北的俄罗斯飞行员等,最初都具有不同的意见,政策结果都是通过与毛泽东时期不同的决策方式确立的。^⑦ 但在关键的问题上,邓小平仍

① 《邓小平文选(1982-1992)》(第三卷),第372页。

② 《邓小平文选(1982-1992)》(第三卷),第366页。

③ 《邓小平文选(1982-1992)》(第三卷),第321页。

④ Lu Ning, *The Dynamics of Foreign-Policy Decision-Making in China*, pp. 87-95, pp. 156-161.

⑤ Daniel Byman and Roger Cliff, *China's Arms Sales Motivations and Implications*, Rand, 1999.

⑥ John W. Lewis, Hua Di and Xue Litai, "Beijing's Defense Establishment: Solving the Arms-Export Dilemm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4, 1991, p. 96; Lu Ning, *The Dynamics of Foreign-Policy Decision-Making in China*, pp. 113-117, p. 145.

⑦ Lu Ning, *The Dynamics of Foreign-Policy Decision-Making in China*, pp. 87-94, pp. 156-166.

然保持最后的决策权。这种特点反映了邓小平时代中国对外政策显著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和特征。

4. 关系导向型的动机

毛泽东为了对抗苏联而寻求中美关系的改善,而邓小平在中美邦交正常化不久便寻求中苏关系的正常化。邓小平亲自策划了这一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展示出了很强的灵活性和务实性。^①一开始,中国坚持苏联消除中苏双边关系中的三个障碍作为中苏关系改善的三个前提条件。这三个障碍包括苏联入侵阿富汗、苏联在中苏和中蒙边境部署大量武装力量以及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其中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是最重要的障碍。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邓小平在1985年10月首先通过罗马尼亚总统向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传达信息,表示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办到的话,他愿意与戈尔巴乔夫会面。^②1986年9月,在接受美国CBS电视台“60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Mike Wallace)的采访中,邓小平再一次提到这个愿望。他说:“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是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只要这个问题消除了,我愿意跟戈尔巴乔夫见面。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年龄不小了,过了82了,我早已经完成了出国访问的历史任务。我是决心不出国的了。但是如果消除了这个障碍,我愿意破例地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相信这样的见面对改善中苏关系,实现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很有意义。”^③最开始苏联拒绝就这三个条件进行谈判,但是中国始终坚持。在苏联满足了中国的三个条件之后,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会晤最终于1989年实现,邓小平提议戈尔巴乔夫“结束过去”,并为中苏关系“开辟未来”。^④

邓小平关系导向型的动机在他处理中国与其他超级大国关系的方式中也得到充分的体现。1989年,中美双边关系陷入僵局,在与当年12月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会晤时,邓小平提议,“我们同美国也应该结束这几个月的过去,开辟未来”。^⑤在讨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时,邓小平指示中国领导人“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友好往来。朋友还要交,但心中要有数”。^⑥关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他认为,“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中国永

① 钱其琛:《外交十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页;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358-368页。

②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23页。

③ 《邓小平文选(1982-1992)》(第三卷),第167-168页。

④ 《邓小平文选(1982-1992)》(第三卷),第291-295页。

⑤ 《邓小平文选(1982-1992)》(第三卷),第331页。

⑥ 《邓小平文选(1982-1992)》(第三卷),第320页。

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①正是由于这种与谁都搞好关系的指导思想,中国不仅克服了冷战结束后中国外交面临的困难,而且国际环境一步步地得到改善。

五 人格类型差异与中国对外政策的变化

以上主要源于一手资料的证据,显示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不同人格特点:毛泽东对外部信息采取一种封闭的态度,保持自己认知的一致性;挑战环境约束;通过自上而下的过程制定对外政策;具有成就导向型的动机。比较而言,邓小平几乎在每个方面都与毛泽东不同。这些不同使他们处于赫尔曼个性类型模型中的不同位置,也使他们成为不同类型的领导人(参见表2)。毛泽东是一个典型的“讨伐型(crusader)”和“战略型”领导人,而邓小平是一个“机会型”和“实用主义型”领导人。虽然他们的信仰体系是相似的,但人格特点存在差异,这可以解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对外政策的变化。

表2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个性比较

	主要领导人	信仰体系	对对外事务的兴趣	相关训练/相关经验	对环境的敏感度			动机	领导人类型
					信息处理	开放性	与约束的关系		
毛泽东	是	马克思主义 共产主义	有	无	自上而下	封闭	挑战	成就导向/ 渐进型	讨伐型/ 战略型
邓小平	是	马克思主义 共产主义	有	无	自下而上	开放	遵守	关系导向/ 咨询型	机会型/ 实用主义型

首先,对外部信息的不同态度使他们对各自时代国际关系主题的认识也有所不同。毛泽东坚信列宁关于现在的时代特征是帝国主义崩溃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坚信社会主义革命的又一次高潮一定会到来。他坚持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他那个时代的中国认为时代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中国革命外交的主题是当时的时代要求,是与当时的时代主题一致的。

邓小平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时对新信息采取开放的态度,看到了国际政治和经济结构的新变化,提出世界已经进入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

^① 《邓小平文选(1982-1992)》(第三卷),第363页。

和平是可能的,发展也就成为可能,从而为中国内政和外交政策的调整提供了思想上的保证。

毛泽东和邓小平对时代主题的不同认知与他们对战争可能性的认识有很大关系,进而决定了他们对战争的态度也不完全一致。毛泽东多次通过历史类比来加强他的信仰: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生了十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再次发生世界大战,就能产生更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中国不应该害怕战争。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一直在为战争做准备。^①“备战、备荒、为人民”曾经是他那个时代的响亮口号。邓小平认为在新环境下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因此大战是能够被延缓,甚至是可以避免的。这种转变也反过来带来了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从前者服务后者转变为后者服务前者。中国外交的任务开始转变为,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持久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

其次,由于毛泽东与邓小平对外部环境的态度不同,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他们各自时期的状态也有所不同。有研究指出,“毛泽东始终作为现存社会秩序的挑战者出现的,不论在战争年代和和平建设时期,都是如此。这既给毛泽东带来了巨大成功,也造成了巨大的失误”。^②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等思想,一生谋求根据自己的信仰摧毁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他自己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打倒蒋介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另一件是胜利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③他的战略思想是人民战争,手段是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在认识到苏联已经成为修正主义的时候,认为中国共产党有责任、有义务担负起率领各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支持亚非拉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结成最广泛的反帝反修国际统一战线。与这种国家战略相适应,在国内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在外交上,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外交总是以革命者的姿态出现。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提出三大政策:“一边倒”、“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彻底结束了旧中国的屈辱外交,也是对当时中国外交环境的全面挑战。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就赴苏联重新谈判同盟条约,以取代旧的国民政府与苏联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①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84、363页。

^② 李捷:《毛泽东向两极格局的挑战——50年代后期到1976年的中国外交》,载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第646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49页。

虽然最初斯大林并不乐意改变现状,但在毛泽东的坚持下,双方还是签订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取代旧条约。“另起炉灶”不仅是要按照“谈判建交”的原则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而且还要按照自己的标准建立一支“文装解放军”。“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彻底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权,将外国在中国的投资“一扫而净”。在国际上站稳脚跟后,中国在外交上开始对外宣传“武装斗争”和“人民战争”的思想。到了20世纪60年代,更是提倡“与帝国主义斗、与修正主义斗、与各国反动派斗,增加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和援助”的“三斗一多(增)”政策,与国际社会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

与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基础,强调斗争的对外政策主题不同,邓小平认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① 邓小平一方面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②另一方面强调“因地制宜”,按照“经济规律办事”。^③ 他意识到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变了对西方世界的态度,把融入和适应国际社会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停止支持第三世界革命,开始了中国参与现有国际秩序的进程,全面参与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所有活动;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恢复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并积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放外国私人投资;派出成百上千中国优秀学生去海外接受高等教育……在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中,中国与国际社会形成了良性互动,形成了密切的关系。

再次,因为处世的动机和目标不同,中国对大国的政策以及与主要大国的关系在改革开放以后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总有一个反对的对象:20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④ 在60年代既反美帝又反苏修。70年代则是联合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国家,联合“一大片”,结成“一条线”,联合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中国所反对的一直都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这也成为中国革命外交最显著的特征。

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明确表明,不会与任何超级大国建立联盟或战略关系,不联合一家反对另一家,而是坚持独立自主的不结盟政策。在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后不久就开始探讨实现与苏联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在谋求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邓

① 《邓小平文选(1982-1992)》(第二卷),第311页。

② 《邓小平文选(1982-1992)》(第三卷),第284页。

③ 《邓小平文选(1982-1992)》(第三卷),第286页。

④ 韩念龙:《当代中国外交》,第6页。

小平告诫有关人员,不要以中美关系的恶化为代价来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即便是在1989年之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华实施制裁的时候,邓小平依然表示,“我们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①

最后,由于以上主要方面的差异,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地区政策以及与小国的关系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毛泽东参加革命之初就提出,“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革命的成功需要“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为了反对一个超级大国不仅需要与另一个大国结成不同形式的同盟关系,也需要与广大第三世界的国家建立统一战线。因此毛泽东时期的中国虽然是一个地区国家却没有一个地区政策,对大多数地区和小国的政策是根据中国与大国的关系以及这些小国与超级大国的关系决定的,即“以苏划线”或“以美划线”。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抛弃了“划线”的做法,并反复申明,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尊重别国在历史上形成的与大国之间的特殊关系,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所有国家建立全方位的外交关系。^③在国际事务上,中国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政策和立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国与小国的关系开始摆脱双方与大国关系的束缚,真正建立在双边关系的基础上。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逐步摆脱了大国的影子,形成了拥有自身逻辑的周边战略。^④中国外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六 结论

本文关于人格类型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结合的分析具有以下两点意义:一是有助于建设超越西方外交实践的对外政策分析理论框架;二是有助于从新的视角深化对中国对外政策的研究。

研究中国对外政策的学者普遍强调“将比较对外政策研究更充分地融入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的必要性。^⑤本文展示了这一目标是可以实现的。首先,人格类型理论

① 《邓小平文选(1982-1992)》(第三卷),第359页。

② 《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3页。

③ 韩念龙:《当代中国外交》,第340页。

④ 牛军:《冷战与中国外交决策》,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273-295页。

⑤ Thomas J. Christense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Conclusi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 p. 391; 王缉思:《国际政治的理性思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29页。

为中国对外政策分析提供了可操作性的工具。其次,得出这些理论框架的众多案例研究也为对中国对外政策进行比较研究提供了背景材料。通过这种比较,我们可以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对外政策的中国特色。最后,考虑到当今中国不断提升的国际地位和更加积极的外交,任何一种对外政策理论如果忽视了中国的情况,或者不能解释中国的案例,那么都是不完整的。从对外政策分析的视角看,将中国对外政策研究与对外政策分析理论结合起来对理论建设是非常必要的。

从理论建设上看,本文的结论表明,赫尔曼的人格类型理论在中国对外政策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局限性。她的人格类型框架能够解释毛泽东和邓小平时期中国对外政策连续性和变化。但是,相对而言,赫尔曼的人格理论更好地解释了邓小平人格特点与中国对外政策的关系,然而这一模型并不支持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的普遍观点。这是因为邓小平在成为最高领导人前后可能显示出了不同的人格特点。与毛泽东在遭遇政治反对者时诉诸直接的政治斗争的方式相反,邓小平在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选择遵守政治约束,直到政治约束不复存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批为“走资派”,他屈服于这种批评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因此其人格特点还无法完全展示出来。但是,当他成为主要领导人后,人格特点得到全面的展现,并很快成为一个“实用主义型”的领导人。邓小平的经历说明,领导人个性影响对外政策结果的程度取决于他/她是否拥有足够的影响力或是否处于支配地位。

赫尔曼的理论能够解释毛泽东时代对外政策的革命主题,也能解释当时的国内政策。然而,这一框架不能解释毛泽东的认知方式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变化和对美国的成功开放。这一模型没有预料到对环境“封闭”、成就导向的毛泽东会这样做。这种不一致暴露了赫尔曼的理论的局限性。究其原因,是因为领导人的人格特征是一个渐进的社会过程,政治活动是动态和最具活力的,更何况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因素是多元的。但是领导人人格类型的理论框架却总是静止的,因此在运用静态的分析框架时既需要将政治的动态性考虑在内,更需要考虑其他国际或国内的客观因素,人格绝非唯一决定的因素。

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的视角看,本文并没有否定其他层次的分析框架的效力,也不拟否定这些理论在未来研究中国对外政策中的意义和价值。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一直是塑造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并会继续产生影响。正如东亚正在进行的权力转移所显示的那样。随着中国融入国际体系,不仅传统国际力量格局会对中国对外行为产生影响,而且国际规范和中国参与的国际机制在塑造中国对外政策方面也将会变得同等重要。

不仅世界对中国的影响在增加,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也是前所未有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对外政策机制正在经历“专业化”、“组织多元化”、“权力分散化”的过程。^① 随着对外政策议程的扩展,越来越多的国内利益攸关方在参与对外关系。它们有不同的利益考虑和政策主张,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试图影响对外政策的结果。对外政策决策过程成为一个复杂的协调不同利益的过程。虽然邓小平以后的中国领导人不可能像毛泽东和邓小平那样采取自上而下的方法制定和管控每一项对外政策,但是,确保中央的政策能够得到贯彻落实,需要最高领导人更多地介入对外政策。因此,他们拥有更多的机会和不同的手段去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结果。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外交职能部门强调,“加强外事工作的统筹协调”和“要从顶层设计角度对中长期对外工作做出战略规划”,也是上述趋势的表现和证明。^② 根据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是为了统筹和协调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因此,新一代领导人的人格特点可能会以与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有所不同的方式对中国对外政策产生影响。

总之,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因素在增加,既有国际的也有国内的。但是,除非最高决策者注意到这些因素,并在决策的时候把它们考虑在内,无论外部系统因素还是国内社会因素都不能对中国对外政策产生显著的影响。在分析和研究中国对外政策时,需要一个更加复杂和更加精确的综合性的分析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将领导人作为分析的核心,同时不忽视国内和国外其他因素的影响。这种结合既是对外政策分析理论建设的需要,也是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的需要,两者的结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共赢的。

(截稿:2014年5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① David Lampton,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0-27; Linda Jakobson and Dean Knox, “New Foreign Policy Actors in China,” SIPRI Policy Paper, 2010, p. 26.

^② 杨洁篪:《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理论 and 实践创新》,载《求是》,2013年第16期,第10页。